

1957 年戛然而止的整风和突乎其来的反右

□文 / 张家康

“东风好作阳和使，逢草逢花报发生。”1957 年的早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如“阳和”的暖气，催生出思想解放的活跃景象。中共“开门整风”，真正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然而，春去夏至，形势逆转。5 月 15 日，毛泽东为党内干部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以此为标志，开门整风戛然而止，突乎其来的则是全面反击右派的进攻。短短时间内，转换变化得如此之快，这其间究竟有着怎样的逻辑链条和因果关系呢？

多事之秋的一九五六

1956 年 2 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报告，揭露和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在各国共产党尤其是东欧各国共产党中引起巨大的思想震荡。共产国际解散后，各国共产党虽然可以独立自主，但是苏共仍是共产主义世界的核心，斯大林依然是世界革命的领袖，苏联模式依然被奉为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楷模。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颠覆，着实引起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混乱和震惊，尤其是东欧各国。

当时，东欧各国照搬苏联模式，片面发展重工业，不注意发展农业、轻工业，不注意解决人民的生活福利，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酝酿已久。当斯大林被赫鲁晓夫贬下神坛，各国积压已久的不满情绪迸发

出，其中最为典型、最有影响的当属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

波兹南是波兰西部的工业城市。这个市的采尔盖斯基厂工人代表团曾就工人收入下降和劳保福利不得兑现的问题向当地政府申诉，但遭到拒绝。于是，这年 6 月 28 日，1.6 万人走上大街和平示威，口号是“要面包要自由”“俄国佬滚回去”“打倒秘密警察”等等。但很快，游行队伍与警察发生冲突，继而袭击了波兹南市人民会议、波兰统一工人党市委及检署、监狱和电台等机关和部门。当时，波兰政府出动武装队伍和坦克平息了骚乱。冲突中，双方死亡三十四人，伤二百多人，三百多人被捕。

事变中，被斯大林赶下台的波兰党前总书记哥穆尔卡被重新推拥上台。10 月，苏联出动军队对波兰首都华沙形成包围之势，逼迫波兰党做出让步。在哥穆尔卡承诺“真诚地忠实于人民民主制度和波苏联盟”后，苏军才退回原地，事件得以平息。

无独有偶，波兹南事件刚刚平息。10 月 22 日，受波兹南事件影响，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各大院校学生团体召开会议，要求摆脱苏联控制，建立平等的苏匈关系，要求政府还人民以民主自由，重新选举党的领导人，要求改变苏联模式，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改善人民生活。23 日，20 万人上街游行，呼喊激烈口号，要求纳吉

上台，要求苏军撤回去。匈牙利劳动党第一书记格罗发表广播讲话，指责游行群众“反苏”，致使对立情绪更加高涨。群众占领了军事仓库、电话交换台、电台和报社等重要机关，政府已经失控。

1957 年 1 月 18 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去年这一年是多事之秋，现在还是多事之秋，各种思想还要继续暴露出来，希望同志们注意。”果如毛泽东所提醒，受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影响，1956 年中国的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工人罢工、农民闹事和学生罢课的事件明显增多。从 8 月底到次年 1 月，全国各地共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还有几十个县的农民闹事。到 1957 年上半年，闹事的数量和规模较又有了增加和扩大。这些罢工请愿事件，多是提出一些经济要求，而这之中又多是由官僚主义作风引起的。

建国后所出现的这些新情况、新问题，使一些领导同志慌了手脚，对事情作了误判，对人民群众的一些诉求，敷衍推诿，对少数人闹事，采取强制性措施，走到了与群众对立的被动局面。毛泽东不赞成采取简单粗暴的方法对待群众，他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一九五六年，在个别地方发生了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课的事件。这些人的直接的原因是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这些要求，有些是应当和可

能解决的”。他尖锐地指出：“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又说：“一九五六年，还有少数合作社的社员闹社的事件，主要原因也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对于群众缺乏教育。”他认为，问题的根子还在党内。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提请全党注意，官僚主义的危险依然存在。他认为官僚主义作风在县委一级尤为突出，说：“县委以上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么，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搞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也正是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郑重宣布：“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对于整风，“我们主张和风细雨，真正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也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期间，兰州林业学校在处理罢课事件中采取抓人的做法，毛泽东对此明显表示了不满。1957年1月27日，他在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批评道：“兰州林校三百人闹得天翻地覆，无可奈何，捉了几十人，处理的简单了。”他告诫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必须避免使用武力，不要学习国民党的办法，除非真正是反革命暴乱，才可以使用武力对付。”他提出，对待少数人闹事问题，第一条不提倡，第二条不怕。要因势利导，“要学会这么一种领导艺术，不要什么事情总是捂着。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对闹事又怕，又简单处理，根本的原因，就是思想上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是对立统一的”。又说：当前少数人闹事，“大量

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

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章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撰写，全文共两万字。毛泽东对文章作了多处修改，集中反映了他对世界范围内矛盾问题的理论思考，首次公开发表他的两类社会矛盾的思想，即“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其中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方法，即“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在特定情况下，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由于矛盾的一方逐步转到敌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转化成为对抗性的矛盾。”这些思想对1957年春夏间的整风和反右，都具有指导性的意义。

毛泽东说自己是一个游说家

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发生后，有人担心中国会出现类似的事件。但毛泽东对此颇为自信，说我们的农村政策和城市政策是正确的，政治资本在我们手里，“所以，像匈牙利事件那样的全国性大乱子闹不起来，无非是少数人要搞所谓大民主。我说对大民主，第一不怕，第二要加以分析。”他说，少数人闹事，除了社会上仍有“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存在”的原因外，那就“是由于领导上存在着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政治的或经济的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有些不是政策不对，而是工作方法不对，太生硬了。”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说：“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让几种花开，还有几种花不让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

需要这个。”他在多事之秋的1956提出这个“双百”方针，是极有针对性的，也是即将开始的整风运动所遵循的原则。

青年作家王蒙创作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发表后，引起各种反应。毛泽东基本肯定了小说，以表明他欣赏用小说等文艺形式，揭露批评党内不好的东西。他极为形象地说：“只允许香花，不允许毒草，这种观念是不对的。香花是从同毒草作斗争中出来的。香花和毒草齐放，‘落霞和孤鹜起飞’。”

1957年2月27日至3月1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题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再提少数人闹事问题，指出：“这些闹事，不能说主要是因为反革命，而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工作中的缺点，我们不会教育，不会领导。我说人民内部经常不断地发生矛盾，罢工、罢课，农民打扁担，去年有，今年还会有，以前几年就有，不能归咎于匈牙利事件。”他又说：“百花齐放，百家齐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

这些耳目一新的新观点、新思想，深深打动在场的每一个人。会后，他在回答与会者提出的问题时说：马克思主义是不怕批评的。老干部如果批评倒了，那就是该批评的。什么叫“长期”？就是共产党的寿命有多长，民主党派的寿命就有多长。他还说：“现在工作方法已经改了，是小民主。但有些地方不实行小民主，任何民主都没有，横直是官僚主义。这样就逼出一个大民主来了，于是罢工、罢课。我们不提倡罢工罢课，提倡在人民范围之内的问题使用批评的方法来解决。”

在毛泽东的建议下，3月6日至13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科学、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方面的党外人士也被邀参加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谈了很多与会者关心的问题,诸如百花齐放、文艺批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继承文化遗产、文艺的目的等等。座谈会气氛宽松活跃,他对知识分子持十分肯定的态度,说:“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要好好团结他们。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

毛泽东在会上再提中共将正式开始党内整风,说:“现在在共产党中央作出决定,准备党内在今年开始整风。党外人士可以自由参加。这次整风,主要是批评几种错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他告诉与会者,“放”是个基本性的长期方针,绝非是权宜的暂时性的方针。“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方法。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

会后,毛泽东于17日乘专列离开北京前往杭州,途中逗留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地,于21日到达杭州。在几天的旅途中,毛泽东作了4场报告,内容都是关于即将开始的党内整风。他思维敏捷,语言幽默,态度诚恳,体现他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精髓,表现他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自信及虚怀若谷的真诚,寄托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的理想和希望。他的轻松且富有幽默的讲话,给与会者留下难忘的印象。

在第一站天津,他在报告中说:全党要学会搞建设,学科学。这就需要向先生学习,“先生是谁?先生就是现在的党外民主人士。我们态度要好,不要摆官僚架子,首先承认自己一窍不通。”他批评压制不同意见的做法,“是继续过去那种简单的方法,你不听话,就‘军法从事’。那是对付敌人的,那个办法不行了。凡是科学方面

的问题,思想方面的问题,精神方面的问题,都不能够用粗暴的方法。”

到济南,他在报告中针对少数人闹事是双百方针“闹出来的”观点批评说:“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无论是肃反、土改、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中间,都有主观主义的错误,有官僚主义的错误,也有宗派主义的错误。”又说:“现在的方针不是收,而是还要放,现在还是放得不够。”

在南京的报告中他说:“中国这个国家,知识分子太少。对这几百万知识分子,我们如果看不起他们,如果以为可以不要他们,这种观点是不妥当的。我们离不开他们,这种观点是不妥当的。我们离不开他们。”他继续吹风“放”的方针:“这么一放,会不会天下大乱?会不会像匈牙利事件那样地把人民政府打倒?不会,中国的情形跟匈牙利不同,共产党有很高的威信,人民政府有很高的威信。”

他在上海的报告中说:“比如讲群众闹事这样的问题,是若干个别现象,但是会经常不断地有,因为官僚主义总是会存在的。凡是出官僚主义的地方,那个地方的群众就可能闹事。”他期待通过整风,“把我们中国变成这样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民敢于批评,敢于说话,有意见敢于说,不要使人不敢说。不论什么都可以说,使我们这些在台上的同志有错误、缺点逼着改,不解决不行。”

由北京出发至杭州的行程中,毛泽东每到一处都要针对党内外各种思想问题,台上谆谆报告,台下解疑释惑,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方法就是用民主的方法,也即开门整风的方法。他幽默地说:“我现在正在反复说明这个道理,到处进行游说,成了一个游说家。”

中肯建议和越轨言论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

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5月1日,这个指示在《人民日报》公布。次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什么要整风》。此后,由整风为主题的各种座谈会一个接一个召开,会上大多数人都能敞开心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鸣放的言论大都是正确或基本正确的,许多意见可谓一针见血,切中时弊。其中对党政关系、党群关系、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法制建设和左的偏差等,都有十分中肯的建议。

其中批评党员干部不喜欢“五湖四海”,热衷于“清一色”,不信任党外干部,无形中在党与非党之间筑起一道“墙”,挖了一条“沟”。

其中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谈了很多有益的意见。茅以升和沈志远谈到了经济建设集中和分散的问题,建议“在做计划时,要分别轻重,预留伸缩,规定出哪些是必须由中央集中的,哪些是可以容许有‘自由市场’的,哪些是必须完成的,哪些是可以伸缩的,尽量把事权下放,并且把集中和分散的比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逐步加以调节。”“社会主义是需要计划管理的,但过多的计划管理,就会损害自由,妨碍积极因素的发挥,社会主义是要集中化的,但是过多过死过紧的集中,就会损害灵活主动,同样会妨碍群众积极性的发挥。”

其中对法制建设中的一些问题提出批评,指出宪法虽已公布,可仍有一些党员干部对法律持虚无主义的态度。他们还反对法治建设中“无法可依”“有法不依”的现象,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和期待。

诸如此类的建议和批评是善意的,有利于改善和巩固党的领导。

据统计,中共中央统战部受中共中央的委托,于5月8日至6月3日,在全国政协礼堂共举行13次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5月15日至6月8日,中共中央

统战部、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 25 次全国工商界座谈会。各级党政机关和高等院校、科学研究机构、文化艺术单位的党组织也纷纷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和小组会,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欢迎大家“鸣”“放”。如前所述,这些“鸣放”中,很多是中肯的、善意的批评,期待着中共执政能力的改善和提高。

然而,鸣放中也出现了激烈的言辞和不和谐的声音,一些越轨言论甚至把批评的锋芒对准现行的政治制度。

民盟中央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主席、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在座谈会上说:“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民主建国会常委、粮食部部长章乃器在会上提出:“现在有一部分党员,党内一个是非,党外一个是非,把‘党党相护’当作党性。”

民盟中央副主席、森林工业部部长罗隆基在座谈会上要中共作出保证,在对党进行批评以后,不致在将来受到打击报复。他提出由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委员会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偏差,还要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这个委员会包括领导党,也包括民主党派和各方面的人士。他还主张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应该成立这样性质的委员会,使之成为一个系统。这个系统的机构,后来简称为“平反委员会”。

《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继章乃器“党党相护”的话题,提出“党天下”的问题。他说:“这几年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

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在谈到“职务很不相称”的党员干部时,他又说,是党把这些人“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上海《文汇报》全文刊登储安平的发言,“党天下”的言论很快流传开来。有人在会上大加赞赏,并发挥说,在延安整过主观主义,越整越厉害,无产阶级专政是个“根”,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越反越多。有人直接把整风运动叫作“下轿”运动,首先在北京的上级干部要下轿,有的还要下台。还有一种人特别应该下台,人民日报总编辑非下台不可,因为人民日报几年来都在歌功颂德。又说,文人的笔杆子天然反现状的,真正的文人是反现状的,从古以来的好文章都是反现状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仅要广开言路,还要“广开贤路”,今天的事应该谁有本事谁来干。

整风中还有人提出,在学校不需要有党派的组织活动,甚至主张“共产党退出高等学校”。

马寅初说批评有否定一切的现象

随着高等院校学生加入进来,整风运动变得失去了控制。5月19日,北京大学大饭厅前的墙上贴出第一张大字报。时为北大学子的陈奉孝在《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中写道:“1957年5月19日下午五点左右,在大饭厅东门右侧贴出了历史系三年级学生许南亭的第一张大字报,无标题,内容是‘全国开团代会,清华有代表,北大有没有?是谁?谁选的?因为正值开饭前夕,许多同学都围着看。”

紧接着,又贴出了标题为《自由论坛》的第二张大字报,明确提出“取消党委负责制,成立校务委员会,实行民主办校”,

“取消秘密档案制度,实行人事档案公开”,“取消政治课必修制,改为政治课选修”,“取消留学生内部选派制度,实行考试选拔制度”,“开辟自由论坛,确保言论、集会、出版、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等。有学生贴出大字报《一个大胆的建议》,建议在北大开辟“民主墙”,以帮助党整风。

大字报越贴越多,到了傍晚已近 200 张。校园内不仅贴满了大字报,还搭了多处讲演台。有文章回忆说:“不等规模的,自发或是有组织的辩论会纷纷展开了,成千的学生,在倾听一场接一场的激烈辩论,学生会宣布从下午 5 时到 10 时是辩论时间,专劈了两个教室并在广场上搭起讲台,装上播音器供辩论之用。”这就是所谓北大的“五一九运动”。

校园内已经乱成一锅粥,可一些学生还觉得“这样不行,容易被各个击破,应当把各系的右派联合起来,用一个声音说话,这样才有力量。”几个分属不同系的学生还在未名湖畔的花神庙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会是晚上开的,大家研究的结果决定成立一个组织。”这个组织的名称叫“黑格尔——恩格斯学派。后来,这个组织名称又改为“百花学社”,所办刊物为《广场》,正式发表《百花学社成立宣言》,宣称“要发扬五四精神,把五一九运动进行到底。”他们还希望借助报纸,把声势造到社会上去,可一直未能遂愿,如《广场》中的文章写道:“运动已经发展几天了,北京各报记者天天来北大,而迟迟不敢报道,使同学们极为不满,纷纷提出质问,有人直接到党中央和北京市委谈北大情况,并要求支持同学们的正义行动。”5月25日,《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安排一记者去北大采访,并写成一篇报道于26日见报。27日《文汇报》也发表了相似的报道。这两家颇具影响的报纸,一下子就把北大“五一九运动”捅向全国,各高等院校为之效仿,运动有蔓延趋势。

而《人民日报》一直没有报道北大的

运动,引起了一些学生的不满,他们到北京市委请愿,质问北京市委:《人民日报》为什么不报道运动的消息?他们还去人民日报社贴了大字报,质问《人民日报》为什么不报道北大的消息。不仅如此,他们还组织去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高校,介绍北大的经验,组织人去民主党派,以期得到他们的声援。

这些不受制度、法律和纪律约束的言行,一开始就受到质疑和抵制。如果听之任之,撒手不管,无序鸣放,社会就会乱得一发不可收拾,这一点毋庸置疑。

毛泽东欢迎党外人士对党的工作作风的批评和建议,哪怕是尖锐难听的言词,如北大教授傅鹰批评中所用“箕豆相煎”“深文周纳”“舒不过气来”的激烈语句。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说:“多数人的批评合理,或者基本上合理,包括北京大学傅鹰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过的批评在内。这些人的批评的目的,就是希望改善相互关系,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5月16日,毛泽东在党内指示中又说:“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

一边倒的只揭露负面的做法,也受到许多知识分子的质疑,他们认为应该两点论,而不应片面性。马寅初说:“目前有些批评不够实事求是,有否定一切的现象。”“如果现在对北京大学的批评,坏的地方说的很详细,好的地方一点也不说,这是无法令人心服的。”他还说:“单纯批评党委制不好是不对的,党委制好的地方也要表扬。”

民革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也主张实事求是地开展整风运动,警惕整风运动偏了方向。他在整风会上提醒与会者,批评和建议时,不要忘记我们是搞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才刚刚形成,还是在摸索中前进,而资产阶级民主却在人们思想中根深蒂固,一不小心,很

容易用旧民主观点来看新事物,这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他说,在帮助共产党整风中,共产党人对某些批评可以辩驳。他认为,大鸣大放中所提出的意见不一定是正确的。越是言论自由,越应该让对方辩解。只允许自己提意见而不允许辩驳,这是堵塞进步之路。

但这些讲话却在座谈会上遭到一些人的非难,说他是言不由衷,是想“借机会上爬”,是“无耻的民主人士”。紧接着,卢郁文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说:“在报上看到你在民革中央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我们十分气愤。我们反对你的意见……你现在已经爬到国务院秘书长助理的宝座了。你在过去,在制造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墙与沟上是出了不少力量的,现在还敢为虎作伥,真是无耻之尤。我们警告你,及早回去吧!不然人们不会饶恕你的!”

国务院参事李仲公因为讲了类似的话,也收到了一封匿名信。甚至国务院秘书长仲勋也收到一封匿名信,要他“随时随地留意,全家留意”。除此而外,在很多场合还不同程度地出现阻挠不同意见表述的情况。上海复旦大学的整风座谈会上,有位政治经济系教授指出,党的开门整风,说明党的大公无私。我们发现党员、党委有缺点,就应该不扩大、不缩小地实事求是地提出来帮助党进行整风。他还说,一切言论意见不利于团结和离开了社会主义的都是错误的。这些本属再正常不过的意见,却当场受到指责:“我们不要听你的教训!”“不要给我们上课”“不要浪费时间!”甚至受到人身攻击:“太不识相,无耻!无耻!”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舆论开放到底有没有边界和底线,是我们今天理解由整风转变为反右的关键所在。任何时候、任何国家的言论开放都

有边界和底线,只是边界和底线的设置不同而已。其实,早在3年前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的开幕词就设置了舆论的边界和底线,即:“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国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共和国”就是边界和底线。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就已经对一些越轨的言行提出了忠告,他说:

“在学校里头也出了问题,好些地方学生闹事。石家庄一个学校,有一部分毕业生暂时不能就业,学习要延长一年,引起学生不满。少数反革命分子乘机进行煽动,组织示威游行,说是要夺取石家庄广播电台,宣布来一个‘匈牙利’。他们贴出了许多标语,其中有这样三个最突出的口号:‘打到法西斯!’‘要战争不要和平!’‘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照他们讲来共产党是法西斯,我们这些人要打倒。他们提出的口号那样反动,工人不同情,农民不同情,各方面的群众都不同情。北京清华大学,有个学生公开提出:‘总有一天老子要杀几千几万人就是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这一‘家’也出来了。

“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

“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放的那些怪议论,跟我们也对立的。他们讲唯心论,我们讲唯物论。他们说,共产党不能管科学,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合作化坏得很,他们说,共产党能够管科学,社会主义有优越性,合作化好得很。”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十分自信地对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说,中国不会出现“象匈牙利事件那样的全国性乱子”。他也预料到“那些坏人在搞所谓大民主的时

候,一定要做出错误的行动,讲出错误的话,暴露和孤立他们自己。杀几千几万人,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吗?能得到大多数人同情吗?‘打倒法西斯’,‘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这不是公然违反宪法吗?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政权是革命的,社会主义有优越性,这都是宪法里头讲了的,是全国人民公认的。”

各地报纸报道整风的负面消息,给人们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号,似乎中共各级领导发生了严重问题,这些问题不是局部的,而是全局性的,根源在于党委(党组)领导负责制,似乎中共的领导已经发生危机,快要维持不下去了。此时,如果有谁客观公正地评价中共的领导,便会被讥讽为“歌德派”,便会受到嘲笑乃至围攻。

这些完全出乎毛泽东的预料,震惊之余,他对形势作出和原来截然不同的估计。5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指示》,要求各地报纸继续充分报道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的,不加粉饰地报道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的好处。这是整风鸣放以来,中共中央文件第一次使用“右倾分子”“反共分子”这样的称呼。

5月15日,毛泽东写下名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于6月12日印发全党。他对形势作出整风以来最为严厉的分析,语气颇为强硬:“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新闻界右派还有号召工农群众反对政府的迹象”。并提出了政治鉴别的两条标准:“是否真正爱社会主义和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毛泽东本以为广泛听取党外人士的批评意见,“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可舆论开放却为别有用心的人所用。他说:“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

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

5月的北京着实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焦虑着急。毛泽东在最紧张的几天里,天天派人去北京各主要高校看大字报。他甚至问身边的工作人员:“你看共产党的江山能不能坐稳?”他坦言:“右派猖狂进攻时,哪个不着急?我看大家都有点着急。我就是一个着急的,着急才想主意。”

5月25日下午,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京政治局委员接见参加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他在简短的讲话里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第二天,《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刊都刊登了这篇讲话,中共中央已经就错误乃至反动的言论,郑重其事地亮出了黄牌。

但局势的发展并没因此而有所缓解,高等院校出现了跨地区串连,准备上街游行的迹象。6月6日,在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召开的紧急会议上,章伯钧等认为,今天学生的问题很多,一触即发。他们上街,市民就会结合起来,问题就闹大了。目前情况有点像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前夕。没估计到党会犯这样多的错误,现在出的问题大大超过了估计,弄得进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现在我们有责任要帮助党。他还认为,民盟现在大有搞头,主张民主党派要大大发展,同时还要深入到县一级,这样才能真正发挥监督作用。此时,甚至还有公开提出要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说“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制度。”

已不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而是“黑云压城城欲摧”了。

毛泽东决定利用卢郁文事件组织反

击。6月7日,毛泽东约见了胡乔木和吴冷西。吴冷西回忆说:“我们刚坐下来,毛主席就兴高采烈地说,今天报纸登了卢郁文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说他收到匿名信,对他攻击、辱骂和恫吓。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动反击右派的机会。毛主席说,这封匿名信好就好在它攻击的是党外人士,而且是民革成员,好就好在它是有名的,不是某个有名有姓的人署名。过去几天我就一直考虑什么时候抓住什么机会发动反击。现在机会来了,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动反击右派的斗争。社论的题目是《这是为什么?》在读者面前提出问题,让大家来思考。”

这篇社论经毛泽东修改后,于6月8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社论就卢郁文事件进行分析,指出“我们所以认为这封信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因为这封信的确是对于广大人民的一个警告,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社论传递一个信息,中国共产党开始对错误乃至反动的言论正式实行反击了。6月8日和1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和《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

时隔24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对反右派运动作出客观公允和实事求是的结论:“这一年在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向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地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判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D**